

“行走的思政课”的教学形式、运行之困与优化路径

何晓龙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步伐,推动“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提升思政引领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行走的思政课”坚持“大思政”协同教育理念和集体行动,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协同性、数智性等重要特性。“行走的思政课”由于教学场景不同,在实践中形成了田野型思政教学形式、品牌型思政教学形式、反馈型思政教学形式、平台型思政教学形式等,各种教学形式共同实现了全方位、全领域的思政育人实效。“行走的思政课”在教学形式得以丰富和产生育人实效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整合与价值挖掘不足、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阻梗、师资结构和教学资源约束等运行之困。铸牢协同思政育人共同体、构建思政育人对接大平台、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完善思政育人系统制度等,则成为“行走的思政课”提质增效的多重优化路径。

关键词: “行走的思政课”; “大思政课”; 立德树人; 思政引领力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6)08-0112-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社会协同力等^[1]。作为提升思政引领力和社会协同力的关键课程,“行走的思政课”根据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坚持“大思政课”理念,超越传统思政课单纯的理论讲授和思政课实践教学方式,突出强调在“行走”中立德树人和提升思政引领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行走的思政课”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和研究领域,其内涵特征是什么?在实践中有哪些具体的运行形式?又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纾解?这是“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亟须厘清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行走的思政课”的内涵特性

1. “行走的思政课”的概念界定

传统思政课局限于课堂内的理论知识传授,以思政教师讲授为主,单向知识传递,虽然能够确保系统性地传授理论知识,但也容易忽视实践育人的重要面向。传统思政课向思政课实践教学拓展变得十分必要。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有效载体^[2],不仅有利于营造思政教育的“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实践教学空间、情境、氛围^[3],也切实提高了立德树人的实效性。由于思政课实践教学注重由内而外的单向拓展,也出现与思政课理论教学相脱节和难以确保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理论深度与方向^[4]。

“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不仅弥补了传统思政课的缺陷,而且超越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不足,推动思政课走向“全领域育人”“全方位育人”。“行走的思政课”是一堂通过实境式体验构建“看得见”的思政课、多元化教学构建“听得进”的思政课、全域式构建有意思的思政课^[5]。“行走的思政课”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育人与“固魂”相结合等,生动诠释了思政课不应只是纯理论教学的课堂,还应是走进历史、现实、国际、未来,融合线上线下、时间空间、校内校外、国际国内、当下与未来的思政课,从而有效践行“大思政课”理念。

具体而论,“行走的思政课”有以下四重意蕴:一是注重时空融通。思政课实践教学主要通过物理空间拓展和“外延扩张”^[6]。而“行走的思政课”实现了从空间整合到时空重构,达到地理空间、历史纵深、现实问题、未来视野的全方位、全领域“行走”。二是凸显全社会协同育人。思政课实践教学注重思政课教师的主体性,而“行走的思政课”是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理念下的一种新样态思政教学模式^[7],在强调思政教师和社会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同时,也注重思政课教学本身与非思政课对思政内容的运用。三是善用数字技术。“行走的思政课”不仅善于运用数字技术让课堂“活”起来,把传统静态授课转变为动态实践,也善于利用数字技术搭建起理论、实践与多学科融合的立体教学体

收稿日期: 2025-1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和实现路径研究”(编号: 24VSZ157)。

作者简介: 何晓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系,还借助于技术手段完善教学体制机制,让思政课学习、监督、评价更精准、更直观。四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行走的思政课”要引导学生走向广阔社会以拓展教学空间资源,充分依托行走经历讲深讲透讲活道理^[8]。“行走的思政课”成为帮助学生全面成长的思政课。

2. “行走的思政课”的主要特性

从“行走的思政课”概念定位来看,其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协同性、数智性等多重特性。开放性体现“行走的思政课”的深度和广度,实践性明确“行走的思政课”的路径指向,协同性展现“行走的思政课”的合力优势,数智性彰显“行走的思政课”的时代特点。

一是开放性。高等教育封闭式办学的传统制约着高校资源的共享^[9]。而开放性有利于打破封闭性,实现资源有效共享和促进公平。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在空间维度,“行走的思政课”在物理空间把课堂从教室延伸到社会^[10],在虚拟空间“行走的思政课”借助于元宇宙等技术打造“平行课堂”,在学科层面推动不同学科与“行走的思政课”内容交叉融合;在时间维度,“行走的思政课”贯通历史纵深,在“时空对话”的对比中达成思政课目的。跨越时空,“行走的思政课”极大增强了思政课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实践性。“行走的思政课”以“知行合一”为目标导向,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依据思政课教学内容,在社会场域开展沉浸式的体验、观察、访谈、调查等实践活动^[11]。“行走的思政课”的实践性推动着课本知识与现实社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主动感知思政教育内涵,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和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与综合素养,并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完成思想升华。

三是协同性。“行走的思政课”实现了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历史资源与时代议题的跨界融合,形成“大思政”协同育人合力。其协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紧密相连的维度:其一,课程协同实现知识融合与价值引领,打破思政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其二,教育主体协同凝聚多方力量形成育人共同体,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育人体系;其三,教育资源协同整合历史资源与时代议题,激发思政课活力,实现思政资源共享。

四是数智性。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着“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方式优化、实践场域拓展,而且使其更具时代性和实效性。在虚实融合层面,虚拟仿真教学利用VR/AR/MR技术打造“沉浸式思政场景”,打破时空限制让历史事件和理论教学更直观;在元宇宙中搭建思政教育虚拟基地,让学生用数字分身参与虚拟社会调研、模拟基层治理等活动,增强互动体验。在智能交互层面,“行走的思政课”依托智慧思政平台,学生可分享行走见闻、开展云端研讨,并形成“实践-交流-反思”的闭环。

二、“行走的思政课”的教学形式

“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场景通常有高校、社会田野、特色场馆、企事业单位、数字平台等。依据“行走的思政课”在不同场景的教学实践,其教学形式可划分为田野型思政教学形式、品牌型思政教学形式、反馈型思政教学形式、平台型思政教学形式等,各种教学形式相互弥补和共同作用,实现了全方位育人和全领域育人。

1. 田野型思政教学形式

田野型思政教学突破传统课堂边界,将思政教育融入社会大课堂,在典型现实场域讲解相应的政策理论,引入多感官体验和全方位实践,强化情境化知识建构^[12]。这种形式推动学生参与劳动、了解社会、生成情感、汲取知识,实现田野实践育人。

田野型思政教学有三种各具优势和特点的具体教学形式:其一,团队式田野思政教学,由具有共同理想信念的教师和学生组成,团队成员超越个人名利,意在田野中凝心铸魂、励志成才和坚持人民立场。团队式田野思政教学主体虽然并非完全由思政教师作为带领者,但是团队教师都能发挥思政育人功能。其二,教师带领式田野思政教学,是由思政教师、科任教师、辅导员、指导教师等高校教师主体,以“三下乡”活动、课堂实践活动、社会调查课题、理论宣讲活动、参观红色场馆等为依托,带领学生“走出去”参观学习、实习实践等。教师带领式田野思政教学打破了“殿堂”式教学范式,帮助学生在“殿堂”“田野”之间穿梭,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在感受鲜活现实中增长才干和培根塑魂。其三,自主参与式田野思政教学,是学生个人和学生组队自主深入田野,目的是完成自己的实践报告、毕业论文、理论宣讲、学术论文撰写、竞赛获奖等任务。自主参与式田野思政教学能在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甩掉团队和教师的“拐杖”,充分激发学生主体性。

2. 品牌型思政教学形式

品牌型思政教学是以学生活动为载体,将其打造为院校特色品牌活动,并在品牌活动开展中达成育人目的。品牌型思政教学常以学生党支部、院学生会、校学生会、院校团委、院校学工等为引导者和组织者,让学生积极参与,在活动中锻炼自我,提高思想觉悟,坚定理想信念。品牌型思政教学也注重挖掘行业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学科特色和特色资源。

品牌型思政教学主要有两种育人形式:一是特色导引的品牌型思政教学,是在师生、行政单位、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打造的学生活动品牌,如一些高校创建的“红色宣讲”活动、野外实践教学模式、红色场馆现场教学模式等。这些特色型思政教学活动通过校校、校企、校地等育人共同体建设,致力于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双重主动性,进而实现启智育德,扩大学生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二是行政主导的品牌型思政教

学,是为了自上而下地完成行政任务,而不得不组织和创建的学生思政教学活动,如高校正在火热进行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理论宣讲会、“三下乡”等。这类品牌型思政教学虽然带有政治性目标,但是现场参与的学生通过送文艺、送图书、送温暖、做志愿等,与基层社会亲密接触,也能增长见识、学习知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学生。

3. 反馈型思政教学形式

反馈型思政教学将社会思政资源引进学校课堂。思政课在“走出去”时常面临着融入成本等问题,如田野型思政教学如果缺少公函或人情关系,学生难以进入田野现场教学。品牌型思政教学虽然想将教学活动打造成品牌和特色,但前提是要与各个机构、企业、场馆等思政育人主体进行交涉,时间精力耗散相当大。相比之下,“引进来”可以降低成本,既让受邀对象进入校园上一堂思政课,讲好自己的“思政人生”,以激发邀请对象的自豪感、被尊重感、责任感,使其有动力接受邀请,也可以通过在校学生分享进入社会中的情感、认识等。

反馈型思政教学主要采取两种特色教学形式:一种是邀请时代楷模、道德模范、英雄模范、改革先锋、领导干部、榜样企业家、有重大贡献人物、老党员、老干部、老教授、民间特色非遗组织以及毕业取得较好成就的往届生等具有正向吸引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思政教师”,将他们引进校园,分享切身经历和感悟体会,开展活态“行走思政课”和上一堂“神仙课”。具有正能量吸引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思政教师”,既是回馈思政教育的再生力量,也能实现学校与社会协同育人,在行走中获得思政资本,在行走中高效培养学生。另一种是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田野调查、毕业实习、“三下乡”等“行走的思政课”活动,将其所产生的成果、经历、心得、情感等,在课堂等教学活动中,分享亲身经历和丰富情感,传递正能量,影响更多的在校学生,实现以点带面。这类反馈主体虽然不同于“社会思政教师”,但他们可以将个人正能量、社会思政人物、榜样力量、国情民情等所产生的思政内容向在校学生传播和分享,推动对同辈群体的思政引领力和带动力。

4. 平台型思政教学形式

平台型思政教学通过线上线下“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平台的搭建、整合、创新,形成虚拟思政教学平台和实体思政教学平台。平台型思政教学丰富了“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形式,有利于在顺应时代发展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大潮中,高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平台型思政教学在两个方面发挥育人功能:一方面,虚拟思政教学平台采用现代数智技术,将社会思政资源通过代码和数据的转换,生成数字化、具有冲击力和吸引力的思政平台,如高校已经搭建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把各种思政资源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复刻和生动再现到数字平台中,借

助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虚实融合教学场景、智能学伴、教育机器人等新型资源开发,使数字教育资源更好地服务思政教育教学活动,让体验者在寓教于乐中获得深刻的精神教育。另一方面,实体思政教学平台通过联结其他学校、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通力合作,为落实国家要求和学校思政教育任务而搭建的新型教学基地,如学生实习实训实践基地、大思政课教学基地等,是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学校等共同搭建的思政教学平台。

搭建实体思政教学基地可以实现思政课教师或者其他教师在现场进行教学活动,既可以使思政教学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也可以使思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活泼和富有感染力,让学生边体验边学习,提升“学思践悟新思想”的能力,还可以使思政课教学更有说服力和活泼性,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合作和共建共享,推动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行走的思政课”可持续发展的运行之困

“行走的思政课”虽然教学形式日益丰富,但在其发展进程中仍然遭遇阻碍思政引领力提升的各种难题,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与价值挖掘、数字技术赋能、师资结构与教学资源等方面。

1. 资源整合与价值挖掘不足

“行走的思政课”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资源整合与价值挖掘的挑战,一方面是时空因素制约着资源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是现有资源的思政课价值尚未充分释放。

一是时空阻隔的资源整合困境。“行走的思政课”资源整合挑战,既来自历史与现实的代际隔阂,也源于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特征,更体现在教学组织过程中的时空协调问题。事实上,“行走的思政课”能运用到的部分资源与学生所处时代环境差异显著,如红色资源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与当代学生所处的时代环境存在差异,学生通过参观只能了解事件,但对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坚守信念的精神内核难以真正理解。“行走的思政课”教学资源载体空间分布分散,导致教学资源时空协调尚存困难。而各种资源载体所处的空间不同,教学时间安排更是难以协调一致,加之各地资源分布较广,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诸多不便。

二是思政课资源价值挖掘不足。为“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所使用的部分资源,仅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度挖掘与系统整合,导致其在思政教育中的潜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如“行走的思政课”在运用红色资源教学时,很多时候仅停留在对故事和事件的简单叙述上,对其背后的思想价值与思政意义缺乏深入探究。“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活动不仅尚未形成整体,而且缺乏对育人活动的统一规划,思政课实效性难以保证。数字技术赋能“行走的思政课”所包含的育人内容通常流于表面,并未真正入脑入心,更缺乏有效反馈与评估

机制建立。

2. 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梗阻

虽然数字技术为“行走的思政课”提质增效提供了新可能,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主要表现在数字素养不足、资源配置失衡、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素养短板导致技术工具与育人目标脱节。部分教师对数字赋能理解不深入,陷入“唯技术”误区,追求教学的数字“炫技”,使教学内容缺乏理论深度。在利用虚拟场景教学时,过分强调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感,却忽视对思政内容深层逻辑的阐释^[13]。部分教师也缺乏数字操作能力,对智能工具存在畏惧心理,无法有效使用数据驱动的教学程序。

二是数字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思政教育“供需失衡”。当前数字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不仅存在地域差异,无法做到公开共享,而且由于多数高校采用独立的数字资源体系,导致优质数字资源难以开放共享,数据流通不畅,基本上仅能服务本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而部分高校对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缺乏考虑学生主体的需求;在数字资源建设上采用标准化模板,导致教学资源供给与学生受教育需求之间存在脱节。

三是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数字技术异化与教育本质背离。数字赋能“行走的思政课”,由于保障机制不够完善,使数字技术偏离了思政育人初衷,进而引发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治理风险。数字技术高效与便捷的特质,使教育主体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对其产生工具依赖,进而导致部分师生主体性消解^[14]。而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完善,更是加剧了数字治理风险。

3. 师资结构与教学资源约束

“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既需要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保障,也需要多元教学资源深度开发与有效整合。在实践中,师资结构存在不合理和教学资源开发不够的问题。

一是师资结构的合理性有待改善。“行走的思政课”对教师的复合能力要求较高,但是当前师资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双师型”教师储备不足与代际能力断层问题。“双师型”教师储备不足,使“行走的思政课”教师的知识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的矛盾仍然突出。代际能力差异显著,使不同年龄梯队的协作效能尚未充分释放。这种代际能力断层直接影响着“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场景的构建质量和思政课发展质量。

二是多元教学资源深度开发存在困难。当前校企协同育人中的教学资源开发与整合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呈现出浅层化倾向,如案例表面化^[15]、元素碎片化、目标单一化;另一方面,教学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多样化思政课教学需求。当前教学资源建设面临“三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即专业适配度低、时代契合度弱、思政融合度浅。

四、“行走的思政课”提质增效的优化路径

从“主体整合—平台构建—队伍建设—制度支撑”四重理路,纾解“行走的思政课”运行中的多维困难,构成推动“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的多维优化进路。

1. 铸牢协同思政育人共同体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并非只是高校及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工作,而是高校所有教师、政府、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多元思政育人主体只有凝聚共识、整合资源、紧密协同,才能使“行走的思政课”教学真正发挥育人实效。

一是凝聚共识是铸造思政育人共同体的前提。让多元思政育人主体秉持共同的目的,是促成其同频共振和共同行动的“软联结”。“行走的思政课”超越和跳出了传统“书斋式”课程思政和单一化思政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的图囿,日益走向“大思政课”视域。“大思政课”理念有益于打破多元思政育人主体间的“隔阂”和边界,转向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共同责任人和共同行动者,并形成了“大思政”教育格局^[16]。

二是资源整合是铸造思政育人共同体的中介。通过共识凝聚,将高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等多元主体整合起来,共同投身于思政教育实践,既能够减轻高校思政课教师和高校的负担,也能够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质量。“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就在于既能激发学生主体性,也能实现校企、校校、校地等“走出去”,还能引进各种社会思政教育个体协同联动。

三是紧密协同是铸造思政育人共同体的动力。多元思政育人主体在凝聚共识和关系整合后,还不足以推动思政育人共同体有效运转起来。只有推动多元思政育人主体紧密协同行动,才能将思政育人的意图转化为实践成效。“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形式创新既在于多元思政育人主体互动联结和共建共治,也在于推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获得更深刻、更广泛、更基础的思政教育,实现在“社会大课堂”“学校课堂”的融会贯通中培塑新时代好青年的理想信念。

2. 构建思政育人对接大平台

多元思政育人主体整合起来协同行动,需要建设思政育人对接平台进行衔接。“行走的思政课”只有建立适应性的思政育人对接平台,将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固定空间和流动空间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思政育人组织化和数智化,才能促进学生和思政课的有效对接。

一是组织模式优化是构建思政育人对接平台的基本要求。“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只有组织化,才能实现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连接。“行走的思政课”通过多元组织形态进行教学,将教师、学生、社会主体等聚合起来,

不仅方便了多元思政育人主体相互对接,还有益于降低大学生接受“大思政课”和对接社会主体的成本和风险。

二是数智技术嵌入是构建思政育人对接平台的重要助推。“行走的思政课”既需要现代数智技术,以缩小思政育人的空间距离,也需要运用现代数智技术丰富教学形式,促使思政教育与时俱进和满足大学生的数智化偏好。在数智文明时代,“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创新必然需要现代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推动数字教师发展和深度教学,促使学生深度学习和深度体验^[17]。“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形式创新就在于能够运用现代数智技术,将思政要素在不同思政育人场景中进行数字化、场景化呈现,实现大学生沉浸式体验和行走。

三是参与方式创新是构建思政育人对接平台的核心要求。参与方式既包括大学生的参与方式,也包括思政育人主体的参与方式。“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关键在于大学生的参与扩大和多元思政育人主体的对接。田野型思政教学形式是在团队、教师、学生自主作用下,通过与地方政府、基层事业单位、村级自治组织等对接,让学生深入田野社会;品牌型思政教学形式是通过品牌创建和行政任务下派,提升学生参与的广度;反馈型思政教学形式是通过增强思政课吸引力、鲜活性、引领力,让广大学生参与进来;平台型思政教学形式是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室和实体基地建设,在制造平台中扩大学生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3. 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在教师,关键是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8]。“行走的思政课”教学的长效运行,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打造。

一是提升教师队伍实践育人能力。在“行走的思政课”教学中,教师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实践和现实的深刻把握,要积极主动为思政课教师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情创造充分条件,保证教师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物质保障来进行调研、实践、学习,以深化思政课教师对社会现实的把握,自觉将鲜活实践和生动现实融入“行走的思政课”教学中。

二是提升教师队伍数字素养。高校应将数字理论知识的学习纳入教师日常的分层分类培训中,提高教师的数字化操作能力,涵盖数字工具应用、教学设计优化、数据分析模型等实践教学核心能力。高校应根据教师不同的数字素养水平展开针对性培训,探索组建跨学科导师团队,为教师提供一对一的数字技术应用指导,并成立数字化实践教学工作研发团队,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指导思政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提升教师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三是优化师资结构。打破传统单一师资结构,建立多元参与的教师队伍。通过汇聚模范典型,分类别邀请深受学生喜爱的各界名家、行业导师、实践导师加入师资队伍,保障师资队伍的教育实施和教育质量。通过邀请各界名家、行业导师、实践导师的加入,可以由此组建出一支具备良好马克思

主义理论素养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行走的思政课”应通过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引进企业优秀人才到高校任教、参与社会调查等方式,加强教师队伍的“双师型”建设,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通过教师、企业、高校的相互选择,以能力导向、技术业务、科研方向为目标,实现人员的流动和调配。

4. 完善思政育人系统制度

铸造“行走的思政课”协同育人共同体,构建“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对接大平台,加强“行走的思政课”教师梯队建设,还需要系统育人制度的保障。健全的“行走的思政课”系统思政育人制度,发挥着引领导向、整合各方资源、规范多元主体的作用。

一是健全组织体系。“行走的思政课”是一项领导引领、资金保障、基地建设、教师配备等多方协同的复杂工程。高校必须不断推动“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地方协同配合、师生共同参与的育人格局,明确责任分工,制定详细的权责清单,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将“行走的思政课”实施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加强支持保障。高校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与“行走的思政课”教学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注重与学生专业相契合,明确学时、学分、授课计划、教学大纲、考核评价机制,在执行时应结合专业发展情况、学生学情分析等,进行个性化设计,有组织地开展教学活动。加强质量监督,成立专门的质量检查机构,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学分落实情况、教学大纲制定和完成情况以及考核方式和考核结果的合理性,确保教学质量。

三是健全数字赋能的制度规范。高校应严格把控数据收集、应用、管理的过程,明确数字育人边界,防止教学进程中的数字工具异化,需注意加强对数字技术运用风险的防控,坚守“行走的思政课”教学的意识形态底线,加强师生数字素养和科技伦理观的培养,提升对数字风险行为的批判性思考,形成规范使用数字技术的良好行为。构建监管模式,高校应利用AI技术搭建监管系统,借助于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技术对教学内容进行智能监管,对虚拟场景、师生互动数据和行为数据进行实时监控,精准识别意识形态风险,自动拦截敏感词,隐藏消极价值观内容的讨论帖,禁止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渗透。

五、结语

“行走的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提升思政引领力的关键课程,坚持“大思政课”理念,以有效促进思政课提质增效,并处理好国家战略和社会需要、教育规律和学生发展等关系。由于“行走的思政课”具有各种各样的融

入场景。本文将“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形式划分为田野型思政教学、品牌型思政教学、反馈型思政教学、平台型思政教学等。不同教学形式共同实现了全方位育人、全领域育人、深层次育人。“行走的思政课”在实际运行中虽然教学形式日益丰富,并产生了良好的育人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整合与价值挖掘不足、数字技术赋能思政阻碍、师资结构与教学资源约束等现实难题。铸牢思政育人协同共同体、构建思政育人对接大平台、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完善思政育人系统制度等,则有利于推动“行走的思政课”提质增效。总体来讲,要使“行走的思政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就必须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共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创造不竭的人力资源和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4(5): 2.
- [2] 赵增彦.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多元化整合与一体化运用[J]. 东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177-180.
- [3] 李仙娥. “大思政”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模式的构建论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1): 106-110.
- [4] 张栋. 高校思政课回归课内实践的必然性与困境[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6(6): 84-87.
- [5] 宋佳兴 陶玉祥. “行走的思政课”: 把“最难讲”变成“最精彩”——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思政课创新实践探索[J]. 人民教育 2024(2): 58-61.
- [6] 徐海霞. 创新“行走的思政课”的实践路径[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4(11): 29-31.
- [7] 谢丽丽.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内涵式发展路径探赜[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16): 57-60.
- [8] 董少校. 行走的思政课: 价值意蕴、实践进路与优化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20): 56-59.
- [9] 西广明. 效率视界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背景及理论支撑[J]. 现代教育科学 2009(5): 10-13+24.
- [10] 黄山峰. 用心用情讲好“行走的思政课”[J]. 党建 2022(10): 70.
- [11] 曾令辉. “行走的思政课”教学规范化建设面临主要问题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0): 115-122.
- [12] 陈红 安华. “田野思政”促一体化教学[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5(8): 12-15.
- [13] 王筱婧. 教育数字化应处理好四对关系[J]. 人民教育, 2025(21): 109-111.
- [14] 许红星 朱晓娟. 数字技术赋能革命文化教育的意义、隐忧与实施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11): 44-49.
- [15] 曹科岩. 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 技术与教育的双重逻辑视角[J]. 教育学术月刊 2025(3): 38-44.
- [16] 叶方兴. 大思政课: 推动思想政治课的社会延伸[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10): 66-71.
- [17] 卢勇.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高校思政课在线教学实践探索[J]. 中国大学教育 2021(4): 79-84.
- [18] 习近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J]. 党建 2019(4): 4-5.

Teaching Models Operation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ing Approaches of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E Xiao-lo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the innovative reform of the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IPC)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enhanc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WIPC adheres to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at integrates “Three-wide Education” (whole-staff, whole-process, whole-domain) and collective action,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practicality, collaborativenes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Through diverse teaching scenarios, WIPC has developed four teaching models: field-based, brand-driven, feedback-oriented, and platform-integrated, which coll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s of holistic ideological education. However, while enriching teaching formats and producing educational effects, WIPC faces operation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bottlenecks in digital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aints in faculty composi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To enhan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e propose sever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mmunities, building integrated platforms, enhancing high-quality faculty team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wal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ding power